

# 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莎士比亚遗嘱手稿发现于1747年,此后便成为研究这位伟大文豪生平最重要的档案之一。该遗嘱于莎翁去世前一个月订立,所署时间为1616年3月25日,共3页,详细记载了家产分配情况,继承人主要是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妹妹等家庭成员,但不少朋友以及当地穷人也从中受益。由于记载翔实,涉及人物众多,学者们往往借此研究莎士比亚的家庭以及人际关系。除此之外,该遗嘱作为一则重要的经济社会文献,既反映了莎翁临终前的财富状况,展现了其一生的奋斗成果,又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乡绅的兴起。

遗嘱正文开头说:“我,来自沃里克郡阿文河畔斯特拉福镇的绅士威廉·莎士比亚……订立本人的最后遗嘱如下”,可知莎翁的身份是绅士,在当时属于乡绅地主阶层。成为乡绅的前提是富有,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这一点从遗嘱记载来看莎士比亚完全具备。

该遗嘱提及的莎士比亚财产可分两类:不动产与动产。其中不动产几乎全由大女儿苏珊娜·霍尔继承,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房产,包括斯特拉福镇的“新地”庄园与亨利街上的两座房子,以及位于伦敦的一座房子,共计四套。二是土地,据遗嘱记载包括“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老斯特拉福村、毕肖普顿村与威尔康姆村(等多处)……我的所有谷仓、马棚、果园、花园、土地”,可知其数量不少。参考其他文献,我们还可以大致估算这批土地的价值。据一份档案记载,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在1596年拥有价值500英镑的土地,这些土地在约翰于1601年去世后应该由长子莎士比亚继承。又据一份土地交易档案记载,遗嘱提到的老斯特拉福等三个村子的土地是莎士比亚在1605年斥资440英镑购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投资活动。由此计算,这些土地的价值应该达到940英镑,加上房产,所有不动产的总价值达1140英镑。

动产分为物品和现金两部分,其中家具、衣物、餐具等主要分配给家人:妻子得到“我次好的床,连同家具”,妹妹苏·哈特、二女儿朱迪思等各有所得,而主要部分“我所有剩余的各类物品、租契、餐具、珠宝与家居用品”留给长女苏珊娜。文件并未标明这些物品的价值,不过就提及物品的数量及其丰富程度来看,亦价值不菲。动产的现金部分在文件中明确的记录,绝大多数由二女儿继承,共计300英镑。另外,妹妹得到20英镑,她的三个儿子每人5英镑;好友托马斯·拉塞尔、弗朗西斯·柯林斯等10人获得20先令至13英镑6先令8便士等数额现金不等;斯特拉福的穷人亦得到10英镑。遗嘱提及的所有现金总数累计373英镑13先令4便士。

作为乡绅的莎士比亚不仅“多金”,而且“位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绅士”称号,后者生前从官方获得这一荣誉。不过,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乡绅地位的获得并不容易,这经过其家族至少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其父约翰本是农夫之子,年轻时迁居斯特拉福镇,通过个人努力成为当地有名的商人,并迎娶绅士之女,在1564年生下莎士比亚。他还积极担任市镇公职,甚至曾担任该镇镇长。在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财富与社会影响力之后,约翰于1576年前后尝试向官方纹章院申请家族徽章,这是当时新富人士获得国家认可、成为乡绅的通常方法。可惜此时约翰生意失败并丢掉公职,甚至不得已四处举债、抵押地产,申请事宜因而告吹,家族振兴大业功亏一篑。这一使命落在了长子莎士比亚肩上。年轻的莎士比亚因家道中落,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赴伦敦闯荡,经过多年努力,在首都戏剧行业大获成功,赚取大量财富。据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在事业高峰期的1595-1610年,平均年收入至少有200英镑,使得家族的经济状况迅速改观,不仅衣食无忧,而且频繁购置上文提及的各处地产。父亲约翰在1596年再次向纹章院申请家族徽章,终于成功获批,正式成为纹章乡绅。根据纹章院档案中有关约翰的徽章批准记载,“这位约翰与同郡籍绅罗伯特·阿登的女儿(即其继承人之一(玛丽)结婚……罗伯特的阿登(此前)曾是(当地)治安法官、镇长以及女王的官员……还拥有价值500英镑的优质土地”,可见申请门槛之高。

成功晋升绅士不仅是莎士比亚家族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有时代给予的良机。都铎王朝后期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这一时期乡绅兴起最直接的体现是人数大幅增加。据统计,16世纪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据著名学者斯通研究,乡绅人数增加直接源于当时社会流动的加快,他将1540-1640年称为“流动的世纪”。换言之,一大批出身非乡绅家庭之人同莎士比亚父子一样,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

16、17世纪英国乡绅的兴起,突出体现了这一时期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一方面,大量莎士比亚式的新富人士成为乡绅,昭示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国家对新富人士广开才路,家族徽章的申请标准偏重财富积累与社会能力而非家庭出身,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 □许明杰

# 抗战期间《四郎探母》也被禁? 趣谈民国禁戏往事

■往事



抗战时期周信芳与叶盛兰排演的《徽钦二帝》

艺术家。还有一些戏被禁,与色情无关,纯粹是倒霉。比如曹锟担任总统期间,不许演《击鼓骂曹》,其实称衡骂的是曹操,和曹锟无关。

## 抗战:不许抗金也不许探母

抗战爆发之后,沦陷区许多戏被禁,主要是一些表现民族气节的戏。

早在“九·一八”之后,在东北走红的京剧名角唐韵笙编了一部戏《扫除日害》,讲的是后羿射日的故事,用这个名字一语双关。唐老板的剧本后来被特务抄走,自己也亡命天涯。

梅兰芳的《抗金兵》和《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都被查禁。麒麟童周信芳则在上海演了半年的《明末遗恨》,这部戏里他扮演崇祯皇帝,对太子说:“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公主问皇帝:“儿有何罪”的时候,崇祯更是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行大罪。”据说每次戏演到这里,台下哭声、喊声一片。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还坚持排了《徽钦二帝》。他扮演宋徽宗,高唱“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为此受到日本特务的死亡威胁,电影《梅兰芳》里日本军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情节是虚构,当年周信芳的危险程度,要远比梅兰芳大得多。

后来日伪政权还禁了《清兵》《陆文龙》《岳母刺字》《杨家将》《史可法》等戏,这是禁戏禁得最悲壮的一个时期。

## 国统区到台湾地区:严禁探母

国统区也在禁戏,倒霉的是《四郎探母》,人们责怪这部戏的杨四郎在北国呆了十八年,投降

了敌人,没有坚持斗争。另一部被禁,而且被打为汉奸戏的戏则是李万春的《班超投笔从戎》,因为李万春和汉奸关系好,这部戏也被国民政府认为是“帮助伪政府宣传参军”的戏,李万春还为此被判刑两年。

《四郎探母》1949年后在台湾仍然被禁了很久,因为许多台湾老兵听了都会想起远在大陆的母亲,他们会哭得很厉害。后来在台湾情报部门的建议下,当局把这部戏的结尾修改为:杨四郎偷出一份北国地图给母亲,让余太君去收复复云十六州,成为惊人愚蠢的笑话。

台湾地区在1949年之后还禁止演以下的几部戏:《霸王别姬》,四面楚歌不让演。《让徐州》,尽管是三国戏,陶谦把徐州送给刘备,但由于“容易让人想起抗战中徐州会战的惨烈,不许演”。有人猜测说,其实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惨烈打击了当局信心。《走麦城》,这部戏过去在戏班子里,是后台比较忌讳的一出,因为涉及到关公(神)的战死,加上会让人想起丢失大陆,长期无人演出。《文姬归汉》《春闺梦》,两出程砚秋的戏都反对战争,容易动摇军心,也不许上演。《窦娥冤》不许演,因为认为此戏是为“美丽岛”人狱人士叫屈。

1984年,曾经有台湾剧团排演了《赤忠报国》,获得了“国防部”戏曲大赛的冠军,不过后来有人举报说,这是大陆《满江红》改编的。于是冠军被收回——这部戏再也不许上演了。 □碧玉



梅兰芳在《抗金兵》中的扮相

# 对当前国学热的冷思考

■钩沉

“国学”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本义是指周代中央在王城设立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

《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但那时讲的所谓“国学”,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1902年,黄遵宪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提到梁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说明至少在1902年,“国学”这个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生前高瞻远瞩地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依照季羨林先生的观点,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

近年来于丹、乾泉等人提出“新国学”概念。新国学即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精髓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新学术体系。新国学,以儒家主体文化和社会为基,撇开传统国学上多样化所存在的糟粕,重新提出国学概念。打破传统国学自我垄断和封闭,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精髓,代表着走向世界,属于全新的中国学术概念。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近年来国学更是炙手可热。“国学热”的兴起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是国人信仰缺失下的精神需要,客观因素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具体讲有以下四点原因:首先是党和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据了

解,截至2015年5月末,国家以及教育部的传统文化相关课题组已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人教育(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海外汉文化教育近700册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作。2017年开始,教育部已经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招收“国学专业”学生。其次是学界的研究推动,再次是来自民间的积极配合;最后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曾说,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指出:“启蒙运动百年以来,尚未解决的真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是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周有光先生生前提出: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2009年104岁时,周有光先生曾撰文指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新时代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应警惕历史复古主义。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绝不是开历史倒车,也不是为了“整理国故”“发幽古之思精”,更不是“装神弄鬼”。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键是通过国学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使之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风采,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去。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在谈到目前的国学热与传统文化时,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目的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要避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这种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钱锺书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

国学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用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人们之所以热爱和亲近国学,原因就在于它能解决人们精神、心灵以及思想层面的种种问题,给予我们人生以营养、力量和智慧。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下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时代性命题。 □史飞翔



莎士比亚遗嘱一页